

—

好一朵逍遥的花呀，在海拔 6000 多米的主峰下，它是唯一的灿烂。一束闪闪发亮的蓬松着的嫩黄，衬托它的叶子硕长如剑，如水仙那般盛开，叶缘上生满了细若游丝的洁白毛茸。花若叶，叶若花，花叶相依，兀自生长在干涸而且粗粝的流石滩上，以不胜娇弱的姿态展示生命的顽强，在这天荒地老的地方，守候着雪豹与羚羊的家园。

这朵花叫绿绒蒿，它生长的地方海拔 4500 米，它面对的披满白雪的峰头，即是阿尼玛卿雪山主峰。我从玛卿岗日主峰下的哈龙冰川前往当雄冰川，途中经过一片砾石滩时，发现了它。在这荒凉高寒之处，我相信只要有路过的旅人看见了它，就一定会有人会自己发现了诗和远方。

近些年来，由于关注气候变暖问题，我到过中国境内的诸多雪山，实地踏勘它们雪线的升降、冰川的盈缩。如果说，大自然用千种声音诉说自身的沧桑，雪山就是其中的一种。气流寒暑，渺渺无形，但万古风云的变幻，千秋气候的轮转，无不一一镌刻在皑皑冰峰之上，每一丛冰凌，每一块冰板，每一片雪花，都是山河无声的笔札。正因为如此，我才在今年溽暑时节，来到阿尼玛卿雪山。

华夏大地，海拔逾 7000 米的极高峰雄峙雪域，有定名、可称述的海拔 6000 米以上的雪山有上百座。大多数静卧于青藏高原群岭之间，诸峰情态各殊，或孤峰拔地，锋芒刺破长空；或连绵相续，雪脊如银涛澎湃。

在一众雪山里，阿尼玛卿独具气韵，不似贡嘎、梅里那般一峰突兀，孤峭傲世，而是群峰连绵，18 座海拔 5000 米以上雪峰参差齿列，4 座海拔 6000 米以上冰峰错落簇拥。峰峦相接，不见断然的起止边际，雪峰并非尖锐，而是芙蓉般叠叠相重。如果是晴天，你会看到冰脊逶迤如银浪奔涌，条条冰川自峰壑



家里木柜深处，静静地躺着一方用旧宣纸包裹着的砚台。砚台石质粗朴，边角残缺，看上去平平无奇。有一年回乡，又见那方残砚，我心想并无用处，随手就要丢掉。父亲见状急忙上前阻拦，高声说道：“不能扔，这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留给咱们家的！”

一方毫不起眼的残损砚台，居然和长征有关？随着父亲的叙说，一段尘封多年、深深铭刻在我家老辈人血脉里的长征往事，缓缓铺展开来。

老家在乌蒙山深处的贵州毕节，这里群山叠嶂、沟壑纵横，苍茫壮阔。

1936 年春节刚过，红二、六军团转战毕节，在寒冬里艰难行军。这支队伍中的一小队途经我们村庄时，到我家短暂驻留。

彼时山河动荡、世道纷乱，深山村寨闭塞偏远，乡亲们不知红军宗旨，只被流言裹挟，对过境军队心生畏惧，只要有军队路过，他们都会躲避。红军到村寨那天，大雪封山。得知他们即将抵达的消息，在外办事的祖父和二祖父匆忙躲进山洞。在家的祖母和姑祖（祖父的妹妹）来不及出逃，只能爬上阁楼藏起来。

那天，几名战士走进我家小院。他们敲门呼喊“老乡”，没有回应，便推开那道未来得及关严的门。屋里煤火正燃，几人围到炉边烤火，湿透的衣衫渐渐腾起缕缕白雾。

我家木楼的楼面是用竹竿铺成的，竹竿与竹竿之间，缝隙虽细密，但仍隐约能看见楼下的举动。祖母生前追忆，进门的红军战士裹着绑腿，脚穿草鞋，衣衫单薄薄蓝楼，因是长途跋涉，他们十分疲惫。

山民日子清贫，没啥好的吃食。甑子里的饭不多，土陶罐里的汤也所剩无几。只有桌上的簸箕里，有几个用火棘果和玉米粉混合蒸制而成的黄粬。深知百姓度日维艰，战士们本不愿动用群众的食物，奈何一路行军饥寒交迫，无奈之下，才小心取了少许黄粬果腹，并用随身饭盒烧了热水暖身。

短暂休息过后，队伍整装待发。按照纪律，理当对老百姓家予以补偿，可他们翻遍农兜也没有什么财物。这时，他们看见堂屋桌案上放着一个用来当作砚台装墨的破土碗，上面还搭着一支用高粱秆自制的毛笔。祖父自幼嗜读，却无力购置文房器具，只得就地取材。一名领头的战士沉默了一会儿，从随身行囊中取出一方残损的砚台，置于桌案之上。随后蘸取土碗中残存的墨汁，在老屋灰褐色的板壁上，工整郑重地写下四个大字：谢谢老乡！

不久后，队伍踏雪远去。看着桌上的残砚、板壁上的大字，一家人伫立良久。此后多年，板壁上的字迹完好留存，对那方残砚，祖父更是倍加爱惜。

听完父亲的讲述，我才知道方寸残砚的背后竟然有着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后来，父亲又把残砚给我的儿子和女儿看。听闻残砚的故事，孩子们眼里满是敬畏。我想，一代代人守住这方旧砚，记住这段往事，就是最好的传承。



熊召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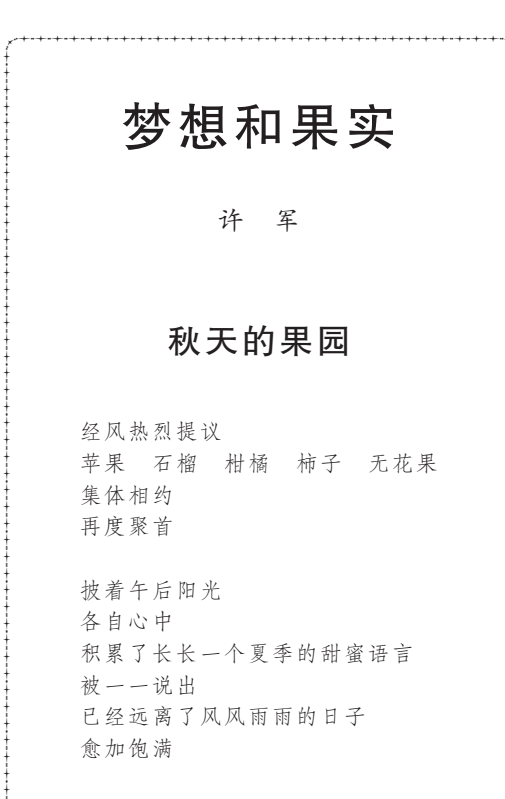
间垂坠而下，冰幔拂过黝黑岩骨，冰塔层叠，凝作千顷素白。站在远处看，它没有一山独大的凌厉，却有群山联袂的沉郁浩荡，冰光漫溢，苍茫浑穆，深沉博大的气度自是不凡。

二

我对冰雪消长之界的留心，始于夹金山。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翻越此山之时，尚处在小冰期余寒之中。当年终年积雪的下界尚在海拔 3800 米上下，盛夏垭口依旧铺着厚厚的积雪。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将士们，怀着坚强信念，甩开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踏上这茫茫雪山。将士们衣衫单薄，在风雪与缺氧双重压迫下艰难攀升，不少战士长眠于此座山上，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一抹不朽的记忆。80 年后，追寻先烈的足迹，我重走长征路来到这里，再也看不见亘古不化的积雪了。气候变暖，冰雪消长之界一路抬升，夹金山再无稳定的雪线。同一山，昔为夺命的冰雪天险，今成车轮可至的青葱通道。从一山风雪消失，我看到气候变迁对时代更移、人类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本是一个哲学的盲者，但可以感知还不能完全认知的气候问题，让我“心忧天下”的意识觉醒。

那一丛绿绒蒿，生长的地方便是冰川退却后留下的流石滩。

循着雪线进退的脉络，巨冰消融退却，山体岩石经冻融反复崩解，大小砾石顺着山坡



经风热烈提议
苹果 石榴 柑橘 柿子 无花果
集体相约
再度聚首

披着午后阳光
各自心中
积累了长长一个夏季的甜蜜语言
被一一说出
已经远离了风风雨雨的日子
愈加饱满

秋天的一座座果园里
沉甸甸的梦挂满枝头
每一份从春天开始孕育的小小幸福
皆触手可及

无数次奋力抵御的烈日和暴雨
最终都化作多汁的内心
和层层紧裹的略显苦涩的皮囊

用双手轻轻捧起
就像稳稳托住了
来自故乡的那轮浑圆的月亮
发了黄的故旧岁月
正散发出淡淡清香

如果继续剥开
一段酸甜交织的琥珀色时光将被重新开启

隐含沧桑的脉络会让人欲言又止

对父亲离休后固执地回老家定居的举动，好长时间里我都能理解。

父亲的老家是浙东四明山区一个古朴的小镇。刚满 16 岁，父亲就参加了四明山区的“三五支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从绍兴军分区转业后，又在家乡小镇的供销社工作了一阵子。也是在这段时间，父亲认识了母亲，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在绍兴军分区，父亲开过一段时间的苏式嘎斯汽车，也算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驾驶员。因为这个专长，父亲被调到我来后出生的毗邻杭州湾的一个镇子，在一家棉花加工厂里专门侍弄我们称作“马达”的柴油发动机。此后，父亲在这个镇子待了近 40 年。

父亲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离休的。第二年的春节，父亲把我们几个子女叫拢开了个会。“我同你们商量个事，我和你们妈准备回老家定居。”父亲也不说理由，一开口就是结果，我们都目瞪口呆。

“回老家定居？房子呢？”祖屋在 1958 年的



▲ 中国画《秋之小道》，作者伍必端，中国美术馆藏。

藤椒，采根茎入药泡酒，味道苦是苦，却能祛手脚的厥气。藤椒作为调料品，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此前，藤椒不被看好，只因浑身上下咋洗都洗不干净的怪味，加上果色也不如花椒中看，便任其野长了。

雅安、洪雅、峨眉山区，常年泉水叮咚，烟岚缭绕，极宜草木繁衍。桂花、栀子、黄梅兰、金银花、“老鹰茶”等，都极香。与它们群居久了，藤椒从头到脚也沾了香气。跟花椒不同，藤椒七八分熟时最香，青皮不忍掐，香油如汗珠子往外滚，闻起来像“气包柑”，滑滑的，凉凉的，鼻子里入，毛孔里出，好像浑身的窍都给拱开了。

乡亲们偶识那果的好，带它走出山林。房前屋后种养，开细白的花，挂青翠的果，花果都透着年轻的阳光，瞧着可爱，闻着敞亮，麻得清爽，香得通透，不遮不掩，刚好对乡村人家的路子。种藤椒不择肥瘦，田边地头，随便捡处地缝，插上植株，浇瓢猪粪田粪，盖上苞谷壳、芭蕉叶，三五个春秋不用管。

那场大台中倒塌以后，老家已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前几天我去了一趟老家，已看好了一处房子。这边厂里宿舍退掉可发 3000 元安家费，我们自己还有点积蓄，你们再凑点就够了。”父亲说是商量，其实像通告。

这年的秋天，父亲正式告别生活工作了近 40 年的镇子，回到家乡四明山区定居。从山头到海头，又从海头回到山头，我不知道这是叶落归根，还是老树新生？

一次节假日，我和妻子、女儿去看父母。父亲只陪了我们半天，就拎着那只大号茶瓶出门了。“父亲好像挺忙的？”我问母亲。“也只有你们回来，他在家才待得牢。平地里拎着一只茶瓶，整天不见人影。”“他在忙什么？”“忙什么？串门、聊天、做‘老好人’。”“父亲还会做‘老好人’？”“他呀，今天给西家送几片感冒药，明天帮东家调停矛盾纠纷。还牵线做红娘，凑成了好几对呢。”母

之山，并不是指阿尼玛卿，而是青海与甘肃的积石峡。曾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人们把积石峡与积石山混为一谈。我来踏访阿尼玛卿的时候，还看到一些文献说大禹治水就从这里（指阿尼玛卿）开始。其实，这是把积石峡附会为阿尼玛卿了。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曾派人来阿尼玛卿考察，使者回去向他报告，黄河之源不是积石峡。阿尼玛卿有另一个汉名“大积石山”，这是为了区分与积石峡的重名。古人认为，阿尼玛卿是黄河的源头，这固然不对，但阿尼玛卿的确是黄河流域最高的山峰。黄河从它的源头约古宗列曲泉源出发，蜿蜒 800 余里来到阿尼玛卿雪山脚下。大河遇此巍峨的雪峰阻挡，于是折返回旋，在这里吸纳万千冰川融水，黄河上游三成水量，便来自这座伟大的雪山。离开雪峰后，黄河还奔涌了 5000 余公里，穿越高原、峡谷、黄土高坡与华北大地，最终注入渤海。毫无疑问，黄河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我眼前这座阿尼玛卿，便是母亲河上游巍然屹立、守护黄河的雪峰，千百年 的风雪冰川，化作大河的乳汁，哺育着中华大地，滋养出勃勃生机。

站在两个冰川之间的这片流石滩上，我与那一株绿绒蒿并肩站立，眺望着玛卿岗日主峰。我在想，从这雪山上流进黄河的每一滴水，无论丰盈，还是消瘦，是涓流还是澎湃，都是上苍的赐予，是天佑中华的体现。它的晶莹养育着品德高贵的人们，它的圣洁滋养着生生不息的东方。绿绒蒿只选择适时生存，拒绝弃地偷生。草木有灵，我辈岂无感悟！今天，我们对生态的保护，对自然的善待，并非单纯索取后的补偿，而是人与天地之间温柔的回应。善待雪峰，便是善待气候的脉搏；善待山河，便是善待岁月的安宁。一草一木，藏着世间的冷暖变迁；一山一水，存有自然的代谢密码。在自然面前，我们只有敬畏，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侥幸！

阿尼玛卿，我与绿绒蒿一起向你鞠躬了。

近日，著名作家王蒙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办气韵生动的副刊》一文，对怎么办好报纸副刊，重点谈了三组关系：编者与作者、郑重与轻松、媒体与舆论。他从个人经历着笔，提出面对网络舆论，“报纸等主流媒体就要有科学、稳定、健康的舆论引导”，“媒体要敢于善于对热门话题发声，亮出观点，更好地发挥我们的报纸副刊在舆论中的亲切与成熟的引领作用”，读后让人深受启发。

居于“报尾”的中国报纸副刊，从上世纪初叶以来，一直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这并非偶然，与其特定位和传统优势有关。当下进入智媒时代，在互联网条件下，报纸副刊的文化建设意义和舆论引领作用不仅不减，反而越来越应受到重视。

文化是时代的风向标，以引领社会风尚、文化传播为主的副刊，是一张报纸最敏感、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文字空间。中国报纸副刊很早就建立了关注现实的传统，从鲁迅先生以《申报》副刊“自由谈”为园地、孙犁先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到巴金、冰心、萧乾、魏巍等文化大家名家，大都从报纸副刊起步，他们以笔和文字为武器，为整个时代的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副刊往往是讲故事，是人间烟火式的温暖交流，是不动声色的感染触发。副刊的这一特点，从效果角度来看，对于社会舆论的引领，至少具有两大优势：一是亲切，副刊的亲和力、烟火气和文化特色，使它天然与读者连在一起，容易赢得读者的亲近与信赖；二是沉稳，比起新闻的争分夺秒，副刊更善于把细节捋顺，把情感打通，为思考留出沉潜的空间，也让道理真正抵达人心。

新的时代条件下，网络舆论场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人都有麦克风，事事可能上热搜，情绪常常跑在事实前面，观点有时盖过真相。如此的众声喧哗，以文化味、思想性、烟火气见长的报纸副刊还要不要参与对舆论浪潮之中？还能不能做时代文化的引领者和建设者？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越是复杂的环境，越需要及时敏锐的发现，柔性有效的表达。报纸副刊近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佐证了这一点。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光明日报文化周末、新民晚报夜光杯等报纸副刊阵地针对饭圈乱象、称谓风气、观众权益、文物真假等诸多社会问题，持续不断地主动展开富有建设性的探讨，澄清谬见、建构认知、引领审美，也因此成为受众读者信得过的文化家园。

一部副刊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报纸副刊的优势，正在于以滴水穿石的柔韧，潜移默化地塑造文化趣味与世道人心。这是报纸副刊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独特路径。文化主体性的培厚，终究要落到具体可感的文化土壤中。副刊日复一日所做的，正是耕耘、维护、涵养丰沃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土壤。

副刊不副，当读者在副刊上屡屡遇见文化之美、心灵之真、思想之深，认同便悄然生根，自信便有了来处。此所谓以文化人，润物无声。

在媒体数字化转型激荡飞扬的浪潮下，副刊当勇立“潮头”，坚持内容为王，在见生活、见文化、见思想等方面更下功夫，跟上技术变迁，强化传播思维，让守正创新成为永远的正途。

副刊有温度，也有锐度。当报纸副刊的每篇文章都带着创造的锐气与生命的热度，报纸副刊的感染力不言而喻，生命力必然长长久久——它会被更多人阅读，会把那些值得相信和坚守的美好交付到更多人的心田里。



把握油温有诀窍。手放到油面上头两三寸高，热烘烘烫烫，又不见油烟，就差不多了。閤藤椒油怕敞气，好不容易留住的清香味本就金贵，跑了岂不可惜？用老法閤出的藤椒油，麻香柔韧透彻，能留至秋后。

藤椒真正出圈是近 30 年的事。享誉天下的家乡美食“钵钵鸡”，迎来风味革新。本是钵钵为皿，麻辣拌鸡，引入藤椒一味，舌尖上的格局立马打开。香上添香，鲜外见鲜，清凉，爽口，还不上火。有了藤椒，“钵钵鸡”口味一新。

藤椒成就网红“钵钵鸡”，也成就川味麻香——洪雅“么麻子”椒麻油。藤椒火了，椒农的腰包也鼓了。小小藤椒树，乡村致富树。去四川洪雅做客，一定记着来时尝一嘴“钵钵鸡”，走时带一瓶“么麻子”咯。



了下来。那几年可真算是苦啊，晚上就睡在山洞、草棚、破庙，吃的、穿的都是附近老百姓勒紧裤带给我们的。有好些我还记得名字，可惜不少都不在了。”

平复了一下情绪，他又说：“我回老家，一是舍不得家乡，总觉得在这里生活踏实自在；二是趁着还能动，为邻里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恩情咱得报啊。”

父亲是回老家定居后的第十二个年头走的。父亲弥留之际，很多街坊邻居来看父亲，镇上卫生院的医生也守在父亲床边。

人到暮年，本是收获的秋天，可父亲让我知道，秋天也像在耕耘。

亲的口气像是抱怨，又透着几分欣赏。

此后去看父母，不到吃饭点，依然难得看见父亲。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经常有人来父母家串门，不少还揣着几颗鸡蛋、拎着几只番薯或一把田里刚拔的蔬菜。二是镇上的人几乎都认识父亲，叫他“老陈伯”，连我也差点脱口而出叫他“老陈伯”了。

父亲不仅自己给乡邻帮忙，他办不了的，还让我来帮。终于有一回，我不耐烦了，抱怨说：“又不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您管那么多干吗？”父亲脸上有点挂不住，只讪讪地说：“邻里乡亲的，好帮就帮一把。”

沉默之后，父亲向我讲了一件事：“我参加‘三五支队’半年后，部队就北撤了。我年纪小，又不是一线战斗人员，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跟部队北撤，二是留在当地参加敌后斗争。当时家里还有 60 多岁的祖母和 12 岁的妹妹，我选择留